

一以贯之

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

戴立宁口述

郭建龙、谷重庆撰写



台湾成功的经验未必能够复制
台湾失败的经验绝对值得警惕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014037060

K825.34
18

一以贯之

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

戴立宁口述

郭建龙、谷重庆撰写



K825.34
18



北航

C1725152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01493708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 / 戴立宁等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086-4425-7

I. ①—… II. ①戴… ②郭… ③谷… III. ①戴立宁—传记 IV. ①K8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3537 号

—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

著 者：戴立宁 郭建龙 谷重庆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2 字 数：467 千字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425-7 / K · 365

定 价：4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自序

一向自诩潇洒，挥一挥衣袖，挥别那昔日的云彩和尘埃。不想留下痕迹，又何必留下痕迹?!

2010年的某一天，吴晓波先生来台发布新书，经朋友的介绍，他来到了我在南港的住所。吴先生著作等身，尤其关心企业的发展，《大败局》一书，述说了企业花开花落、楼起楼塌的沧桑，令人心惊。

个人有幸参与了那个曾经属于台湾的伟大年代，目睹了台湾“经济奇迹”的起落。成功需要太多条件的配合和累积，环环相扣、步步演绎，成败得失往往只是一线之差、一墙之隔。

30多年前，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台湾在搞经济；20多年前，大陆在搞经济，台湾却在“文化革命”。20年的间隔，一些台湾曾经发生的事，在大陆又一一地浮现。经济奇迹，那曾经是台湾的骄傲；骄傲的背后，也曾有不堪回首的辛酸。成功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合，台湾成功的经验也未必能够复制；但是，失败的因子只要一端，失败的教训绝对值得警惕。由于个人曾经亲身经历了那些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这得来不易的警惕添加一份活生生、血淋淋的批注。

我不想、也不愿自己提笔写我自己。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观察；也唯有从多种角度去观察、探究，才会有意义。一向很喜欢苏东坡这个人

他的诗。常常在很多场合引用东坡先生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描述了多角度、多层次观察的差异。尤其之后的两句让人警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是因为自身的关系太切、关心太过，往往会自我迷失、莫知所以。

在书稿编写的过程中，编者王留全希望我写个序，述说一下这本书出版的缘由和心境。我无以为对，正好手头有席慕蓉一首提名为《诗》的诗，或许可以借此表达一些我心底的感受。

曾经热烈拥抱过我的那个世界
如今匆匆起身向我含糊道别
时日推移 应该是渐行渐远
为什么却给我留下了
这样安静而又沉缓的喜悦

重担卸下 再无悔恨与挣扎
仿佛才开始看见那个完整的自己
我的心如果子的果实在暗中
日渐丰腴饱满 从来没有
像此刻这般强烈地渴望 在石壁上
刻出任何与生命与岁月有关的痕迹

从不想留痕，而如今却留下了深深的刻纹。生命的奇妙，世事的无常，能不令人感伤！我自许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性善论者”，更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世人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容或有一些观点上的差异；最坏的情况总会过去，明天只会更好……

谢谢谷重庆和郭建龙两位作者，耐心地听我细说旧梦、无奈地任我勾勒新愁。谢谢王留全、陶英琪、蒋蕾、黄维益和陶之风，为我校读残稿、编辑浮文，排难解纷、妥善一切。当然更要谢谢吴晓波，没有他，这本书不可能出版问市。

政府 vs. 市场——戴立宁谈中国经济

政府和市场都是善的，但要合作才能达成善果

郭建龙：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世界各地都充满了争议。钱颖一曾经提到经济学家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善政府，恶经济人；二是恶政府，善经济人；三是恶政府，恶经济人。在我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第一种看法，即政府是善的而经济人是不好的，这才有了无商不奸的说法。人们也寄希望于政府出手，通过管制来消除经济中的恶。但是钱颖一却认为第三种看法更接近现实，即政府和经济人都存在恶，因此需要对双方进行制衡。对于这样的观点，您认同吗？

戴立宁：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来都有着不同的假设。我曾经读过钱颖一先生的文章，他或许是从制衡的角度来剖析问题吧。但是，我并不同意把政府和市场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还假设其中至少有一方是“恶”的——甚至双方都是“恶”的。

我自许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性善论者，又长期在政府机关服务，自身的体验和信念，让我认为政府和市场之间恰恰还存在着第四种关系：善政府，善经济人。大家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差异无非在于认知和方法，只要勤沟通、多了解，没有不能解开的结。

管理者如果在观念上还是停留在猫捉老鼠、你死我活，两造博弈、零和游戏之上，将是最大的悲哀，也是最大的失败。如何化敌为友、荣辱与共，这正是我倡导的“五指理论”的精义所在。

郭建龙：既然您认为政府和市场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政府是善意的，只是有时候会因为认知和方法的问题达不到效果，反而破坏了市场，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个误区呢？

戴立宁：我讲个发生在台湾地区的实际案例，这个事情存续时间长达 58 年，是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多少人身陷囹圄，多少家庭流离失所。我希望未来在中国大陆，大家能够鉴往知来，千万不要再冒然闯入这个误区。

空头支票是不能兑现的支票，泛滥成灾当然会扰乱金融秩序、破坏社会安宁。

为了防范空头支票的泛滥，台湾当局跳了出来，以充满父爱的情怀，独当其任，扮演“讨债人”的角色。结果呢？随着刑罚的加重，空头支票反而越来越多，“空头支票满天飞，法曹案牍积如山”。监狱满坑满谷的都是票据犯——甚至有人被判了 300 多年；票据犯罪竟然占到了全部刑案的 75%……

直到有一天，社会上各个阶层（包括政府和市场）终于醒悟了，原来这是分工出了问题，这件事情应该交给市场去做，而不是政府。让小姆指做大姆指的事，当然会力不从心，一事无成。如何有效地分工，我的“五指理论”要阐明的正是这点。

证券市场的监督需要所有人共同参与

郭建龙：印象中，“五指理论”最早是您针对证券市场提出的，面对一个极端复杂的市场，您又是怎么将“五指理论”贯彻到您的日常管理之中的呢？

戴立宁：是的，“五指理论”最早提出是在我就任（台湾）证管会^①主委那一天的庆典上，当时我孤身前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面对的是一个变幻莫测、我又未必认可的证券市场。我有心变革，而我的感觉却像小姆指一样疲弱无力，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起一件我颇引以为傲的往事：空头支票刑罚的废除。假如我不能有效动员

^① 1960 年 9 月，中国台湾正式成立证券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管会。——编者注

各方关心、关系证券市场的人士来助我，独木难支，必然会万事蹉跎、一事无成。于是我提出了“五指理论”，我们都是一只手掌上的手指，都希望把事情做好，有志一同，何分你我……

谈到这里，我讲个小故事：

有一年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主题是：证券市场管理。在我之前，日本和新加坡两国证券主管的报告占去了太多时间，轮到我的时候，只剩下十多分钟就到了预定午餐的时间。谁都知道，餐前的演讲要像女孩子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但是，又必须得把最紧要的重点包住。

于是我舍弃了原有的讲稿，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阐述我关于证券市场管理的理念，谁知竟然意外地获得了强烈的反响。

大家都知道，“十次车祸九次快”，所以防范车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抓超速行车。以前为了防范超速，总是安排一位交通警察藏身在阴暗的角落，遇有车子超速，就骑上摩托车追上去给驾车人一张罚单。但是问题来了，车子愈来愈多，而警察限于预算没有办法同步增加，怎么办？聪明的交通管理者想出了一个办法：选在容易超速道路的明显地段，立起了警告牌，大书“前方有测速照相”。于是，防范超速的主要责任从以往的警察身上转移到了每一位驾车人的身上。

交通管理如此，证券市场管理何尝不然。

郭建龙：台湾的股市曾经和现在的大陆股市一样，也有着不少的问题，您在（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任上，又如何纠正这些错误、如何将管理权限下放给大家呢？

戴立宁：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

我就任（台湾）证管会主委没有多久，就遇上了上市公司要出年报的时候。（台湾）证管会收到了许多上市公司的报告，说因董事长出差、监察人生病住院之类各式各样的理由，而无法按时出年报。因为我是主管，等到这些报告到我桌上的时候，已经只剩最后几天了。我知道这些理由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但如果不批，由于时间太短，对方也很难将年报补上。你说我是批，还是不批？

我最终选择了全部批准。

但是，在批准的同时，我立即制定了一条规则并马上公布：下一年如果哪家上市公司未按期公布年报，不管什么理由，都将从当天开始停止交易，直到它补交年

报后的第三个交易日，才准复盘交易。并且，为了防止公众不知情，我还要求在公司还未停牌之前的几天，由股市利用跑马灯播报尚未提交年报的公司名单，提前对公众进行预警。

这条规则公布之后，管理年报按时公布的责任，从此由（台湾）证监会移转到了上市公司的负责人身上。我离开（台湾）证监会已经十多年了，据说之后再没有发生过上市公司敢推迟年报的事。

股市管理者需要的是制定规则，让市场各个参与者按照效率原则各行管理之责，如此而已。

金融业开放趋势不可阻挡

郭建龙：虽然您的“五指理论”、“三把原则”（我知道，台湾媒体更习惯于将“三把原则”叫作“戴立宁原则”）是针对股市提出的，但按照我的理解，实际上，在管理金融业的时候，您已经运用过类似的方法来解决金融问题了。请问：两岸的金融业是否也存在着监管的误区？又如何将您的原则运用到金融领域呢？

戴立宁：两岸中国人的想法其实都是一样的，政府的官员都是出于父爱般的善意，要为子民分忧解劳；金融业关系重大，尤其不能放任……

由于这样长期的金融压抑，不幸在台湾，爆发了“十信案”、“鸿源案”等一连串金融弊案和闹剧，这同时也助长了地下金融。

内部经济的起飞（内忧）和外部情事的变动（外患），会让原有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日益成长的需求。台湾金融业的开放就是发生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被迫、不得不如此。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抱残守缺、闭关自守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就像当年的台湾一样：金融业开放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

金融封闭的年代，金融管理可以“事缓则圆”，一切不妨慢慢地来；金融一旦开放，金融事故愈慢处理就会愈难处理，损害也会愈来愈大。所以管理者的心态必须调整，从“事缓则圆”到“快刀斩乱麻”。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快速有效处理金融事故，事先的规划和有效的分工自然就必不可免。这就回到了我的“三把原则”和“五指理论”上来了。

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对于“公开透明原则”

和“正当管理规范”的要求，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谈的其实就是我的“三把原则”。

就金融事件的处理而言，我想，大陆完全可以从台湾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少走弯路。

郭建龙：对于管理者而言，金融业开放意味着更加难以管理，甚至可能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他们乐意放手吗？

戴立宁：金融业开放当然意味着更加难以管理，所以政府永远会假借一百个借口，述说金融业不能开放的理由。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明的，内忧加上外患，金融业有必须开放的客观要求，政府的金融管理者也必须学习开放情势下的有效管理。

金融管理者当然不愿意这样的改变。金融管制的年代，金融管理者只要打打电话，了不起请来办公室喝杯咖啡（所谓“道德劝服”），就万事 OK 了。不过，社会永远不断地在进步，当然不能够容许管理者因为偷懒、因为无知，而妨碍了社会整体的进步。

金融开放，意味着有效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败。我们庆幸优胜，我们也要学习如何处理劣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不倒神话就此打住”，对于这种劣败的情形有详细的分析，欢迎指教。

郭建龙：和台湾的金融业比起来，到目前为止，大陆金融业存在的危机仍然较少。国有银行的确有呆坏账问题，但经过几次呆坏账剥离，加之银行上市带来的管理改善，这方面的问题也大为好转。这是否意味着大陆的金融问题比台湾的要简单？

戴立宁：正如我前面所分析的，金融管制的年代，管理的工作要简单得多；但是，你相信这样美好的情势能够维持多久呢？金融开放的日子迟早会来临的。《汉书·霍光传》中“曲突徙薪”的故事大家应该耳熟能详；而最近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灾，如果不是将风险刻意隐瞒了 20 年，不敢正视现实，其灾害何致如此？

台湾地区所遇到的基层金融秩序混乱、地下经济猖獗以及放开后遇到的银行倒闭问题，有一天必然也会在中国大陆出现。到时候，台湾金融管理（成功 / 失败）经验的价值会越来越显出它的意义。

郭建龙：通过两岸之间的往返，你认为大陆和台湾在经济、社会生活上各有什

么不同和相同点？我们知道，对于台湾青年，您认为他们应该学习远洋的鲑鱼而不应死守一隅。那么，对于大陆青年，您又有什么忠告？

戴立宁：海峡两岸的同胞，流着同样的血，有着相同的价值观，有志一同，其实都是想生活得更“好”，只不过是“好”的标准和要求容或有些不同。那是因为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大致也不会超过中国大陆城乡、南北、内陆和沿海间的差异。

走过从前，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那是苦难的一百年；战乱和流离，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不知不觉地习惯用西方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来要求自己。中国曾经是“中国”——世界之中，而今沦落为远东——远远的东方，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如何重新拾回自我和那往日的骄傲，是你是我，是海峡两岸的年轻人，是这一代和下一代，不可推卸的责任。



引子

直话直说的国际顾问

2009年10月30日上午8时，深圳五洲宾馆的大厅装饰得一片大红，迎宾小姐的笑容、全国记者的闪光灯、西装革履的人们，无不暗示着这里将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

证券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在宾馆内，将举行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的开钟仪式。创业板已经酝酿十年，从推出伊始就凝聚了中国证监会（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企业、券商和投资人的种种期望。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希望将创业板打造成中国版的纳斯达克，成为高科技创业公司融资的平台；另一方面，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国内经济也深受影响，除了政府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外，监管机构也一改拖拖拉拉的毛病，迅速推出了创业板，这个市场于是也被赋予了救市的重任。

那些西装革履的人们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以及首批上市的企业领导。随着28家公司的董事长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敲响开市的钟声，酝酿已久的创业板正式出台。庄重的仪式无不提醒着与会的人们：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但是，开市的钟声敲响后，这个市场的表现又是否承受得起人们的期待、担当得起帮助创业企业发展的重任呢？

事实显示，在场的人们过于乐观了。

正是由于承受了过多的期待，创业板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烧的态势。在开市的第一天，创业板 28 只股票的收盘价比发行价平均上涨了 106.23%，平均换手率超过 86%，市盈率更是达到了 111 倍这样不可思议的水平。

换手率高是投机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那些申购股票的人们在拿到股票的当天就抛售了。而市盈率高，则意味着即便人们想投资，这里也不适合，因为回报率太低了。

经济界和媒体一片哗然，人们纷纷议论着，这到底是一个有效市场，还是一台圈钱的机器？为什么刚一出台的创业板就呈现出高烧的态势？中国证监会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们信誓旦旦地表示创业板的推出是健康的、合理的；而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创业板已经呈现了博彩的特征，股价的涨跌与公司的实际业绩已经彻底脱钩了。

除了大陆经济学家的质疑声之外，一位台湾来客的声音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戴立宁。

“不要轻易把储蓄放到创业板去！”戴立宁在接受《21 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发出了沉重的呼吁。

戴立宁是何许人？凭什么他可以对大陆的证券市场说三道四？

答案是：戴立宁是中国证监会请来的国际顾问。然而这个顾问有点与众不同，居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一点儿也不顾及自己东家的面子，与国人一团和气的行事原则相比，显得不合时宜。

他的批评在所有的批评声中显得透彻而又尖锐。他认为，创业板一推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投机市场。“当一个市场的平均发行市盈率达到 50 倍以上的时候，这个市场还能剩下多少投资者呢？”他反问道。更何况创业板第一天交易后市盈率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 111 倍，这意味着即便上市公司将所有利润都用来分红，股东用来买股票的本金也要在 111 年后才能收回。对于真正需要投资的人来说，这样的市场已经没有了投资价值。“我们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可能就是在鼓励投机，而非投资。”

首日超过 86% 的换手率也说明人们不愿也不敢将股票长时间留在手中，加之投资收益很低，于是整个创业板会沦为投机客哄抬价格、赚取差额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博傻市场。

那么，这样的市场是如何形成的？戴立宁给出的答案是：“门槛太高，股票太少。”创业板过高的上市门槛导致许多真正有潜力的创业公司无法获得上市资格，能

够满足条件的多是一些已经过气的或者有关系、能够做出漂亮财务报表的公司。以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几家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网易为例，刚上市时，这些公司都没有实现赢利。如果时光能够穿越，当年的这些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即便想在中国的创业板上市，也将由于财务条件限制，连申报的资格都没有。

同时，国内的流动性泛滥，导致过多的钞票追逐少量的股票，抬高了股票的价格。如果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加深水池，这样即便有炒家兴风作浪，由于水深，他也无法掀起太大的波澜。

总之，与人们呼吁抬高上市门槛、加强中国证监会审批职能不同，戴立宁反其道而行，大声呼吁降低上市门槛、减弱中国证监会审批职能，让能上市的公司都上市，提供足够的股票供应，加强股市的深度。中国证监会要做的，只是监督上市企业进行充分的披露，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与国内无数的“事件”一样，经济学家和媒体的呼吁并没有产生效果，戴立宁的呼吁也没有人听。实际上，他的台湾人身份还使他的呼吁令人觉得有些怪，有人质疑他为什么要跑到大陆来品头论足。

但是，时过一年之后，戴立宁的预言却逐渐成了现实。

创业板推出一年后的 2010 年 10 月 30 日，《广州日报》对创业板一年来的表现进行了盘点。在中国证监会的努力下，创业板上市企业已经从当时的 28 家发展到一年后的 138 家（含已过会），不可谓不迅速，但是，这一年来，到底什么人赚钱了，什么人赔钱了？

得出的结论是：赚钱的是公司的大股东、高管、券商、创投公司，赔钱的是中小投资者，有将近七成的中小投资者仍然被套牢着。以上市公司高管为例，为了套现，一年来上市公司高管的离职已经成为常态，此类信息不绝于耳。创业板推出后的短短 10 个月内已经有 24 家公司的 34 位高管离职。离职潮凸显出这些高管们对于公司缺乏信心、急于套现的心情。

更令人尴尬的是，企业一旦在创业板上市，其业绩立即开始大变脸，从上市前的艳阳高照，变成了上市后的秋风秋雨。2010 年中期财报期间，所有已公布半年报的 A 股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44.95%，中小板增长 45.24%，而一直被认为成长性最高的创业板仅增长了 25.63%。

这一切都令人不得不生疑：当初过会时，这些企业的业绩是真的吗？它们上市的目的是圈钱、投机，还是为了企业发展？

创业板推出4年之后的2013年，人们更是意识到创业板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炒作型市场。整体市盈率比普通A股高5倍，2013年上半年净利同比增长只有1.61%，可是，由于创业板盘子小、易炒作，成为市场上各种推手轮番爆炒的目标，股价越来越离谱，没有人能看懂，也没有真正的投资者在内了。

这时再回头看戴立宁当初的预言，才发现原来结果早已在预料之中。或者说，在创业板推出之时，就由于其制度缺陷，一切已经注定了。

戴立宁对于创业板的不同看法让人们重新评价这位台湾来客，让人们不得不审视一下他的身份。

戴立宁，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前主任委员（相当于大陆的证监会主席），在任时对台湾股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台湾的证券市场，有一个与大陆的创业板和美国的纳斯达克功能类似的融资平台——柜台市场，其定位也是帮助科技企业和创业企业筹资，为其提供助推力。从发展上看，柜台市场也的确起到了与纳斯达克在美国科技业中一样的作用。台湾的许多中小型企业最初需要资金时，都是去柜台市场上柜融资，等到企业发展壮大后再去集中交易市场上市。人们评价台湾的柜台市场时，常常将它称为台版纳斯达克（或者台斯达克），认为它起到了科技助推剂的良好效果。

而台湾柜台市场的改造和兴起恰好是在戴立宁的证监会主委任上完成的，这过程贯穿了他的思想。大陆证监会之所以聘用他，也是希望他能够根据台湾经验，对大陆的股市发展提出建议。

而他所在的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也是群贤毕至，汇集了世界各地的证券管理者、投资银行人士。除了戴立宁之外，该委员会还包括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香港证监会前副主席史美伦，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曾担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的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现任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务副总裁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前高盛公司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等。随着时间的推进，国际顾问委员会还在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血液，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威廉·唐纳逊（William H. Donaldson）就在两年前加入。

作为中国证监会聘用的顾问，戴立宁在公开场合并没有给东家面子，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其政策存在的问题。对于创业板的批评并非是他第一次批评他的东

家——中国证监会。

2008年4月，由于股市大跌，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如限制大小非解禁、上调印花税等。戴立宁表示，单一的政策不可能救市，也不希望政府赤膊上阵参与市场的具体运作，他提出“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把信息臻于透明”的“三把原则”（在他掌管台湾证管会时，当地媒体更是称之为“戴立宁原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对股市的上涨下跌出手，而是应当制定、推行规则。对于投资者，政府也不需要保证每个投资者都赢利，而是要告诉他们股市有风险，并引导他们成为合格的投资者。

当年10月，针对市面上要求成立平准基金的呼吁，戴立宁又说，“平准基金实际上是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根本原则”，认为平准基金不仅不会有效，反而会扰乱市场。

除此之外，他的批评似乎还超出了中国证监会的管辖范围。次贷危机后，当人们以美国为例质疑市场、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时，戴立宁却认为政府不应该用“有形之手”代替市场的“无形之手”。针对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问题，戴立宁在强调自由汇率的同时，还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外汇市场，让企业可以利用市场进行风险对冲以避免外汇风险，而不是强行锁死汇率。

人们普遍认为，对政府财经政策提出批评的大多是独立学者，如张维迎、周其仁、许小年、谢国忠等，一旦为官，他们则必须站在官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会变得保守和不愿改变。但曾经担任过高官的戴立宁非但没有沾染上官僚习气，反而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对自由市场的信任，加上他直言不讳的风格，以及对政府持续不断的针砭，才让接受东方式教育已久的国人觉得他有些异类。

然而，人们又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他国际顾问的身份都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才得知的。

2003年11月1日，北京大学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来谈论中国的股市问题，戴立宁也获得了邀请。在会上，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周正庆提到希望提高直接金融的比例。戴立宁站起来客气地表示，对刚才周正庆的提议，他绝大部分都同意，只有极小一部分稍有疑议。他认为，直接金融需要分析各种财务报表，这要求有一个完善的披露制度。但当时中国大陆企业的会计、财务都还跟不上，需要一些时日去完善，因此，在此之前他不赞成快速提高直接金融的比例。

戴立宁强调要对不成熟的证券市场存在的风险保持警惕，不赞成把一般大众的储蓄推向高风险市场。针对大陆的股市，他指出股市参与者有三种人，一是政府，

二是券商，三是一般大众投资人，而这三种人当时都被套牢了。

所谓政府被套牢，指的就是当时的国有股减持问题，消息一传出，股票市场应声大落，导致政府手中握着股票无法放开。所谓券商被套牢，是由于券商不成熟，为获得投资做出了太多保本保息的承诺，但随着股市的不景气，券商没有赚到钱却承担了过多保本保息的义务，被自己的承诺套牢。所谓投资人被套牢，是由于政府当初一度想把 A、B 股合流，消息一传出，A 股下跌，B 股大涨，使得投资 B 股的外国人赚饱脱身，而将国内的投资人深深地套牢了。

戴立宁的“三个套牢”理论一出，全场哗然。于是他安慰说：“既然都被套牢了，那么现在已经是最差的情况，以后也不会再坏了，没什么好怕的。”至于如何解套，他表示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时间和他进一步讨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个月后，戴立宁突然接到了时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的电话。当时开会时，屠光绍就坐在戴立宁的邻座上，戴立宁不知道这位副主席已经开始留意身边这位台湾来客了。

屠光绍在电话里介绍了中国证监会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初衷和成员，并邀请戴立宁参加。于是，戴立宁成为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的首届委员，并一直续任到现在。

戴立宁担任国际顾问一事当年还在台湾（当时处于民进党陈水扁时期）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台湾“陆委会”甚至以刑事责任威胁，试图让他不要接受这个邀请。戴立宁不仅担任过台湾证管会主委，还当过“财政部保险司”司长（相当于大陆的保监会主席）、“金融司”司长（相当于大陆银监会主席）。丰富的任职经历使得有人总是担心和提防着他，这也恰好反映了海峡两岸艰难走过的道路。即便到今天，两岸人民在经济交往中仍然受着各种羁绊和限制，以至于有时候感觉近在咫尺的台湾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还遥远。

戴立宁曾就读于东吴大学、台湾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拥有法学硕士学位，其职业经历主要是在台湾“财政部”。在那里他从基层公务员起步，在 25 年的时间里，历任“金融司”司长、“保险司”司长、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财政部”常务次长，曾经主管过台湾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市场。在当今知识高度分化的世界，在某一金融领域资深的监管人士虽然少，却也谈不上罕见，然而像戴立宁这样横跨银行、保险和证券三大领域的高层监管人士，恐怕为数不多。